

第二講 近代歷史學研究專業化及其問題

壹、講授內容摘要：

1.引言：

1：1 本講主題是「近代歷史學研究的專業化及其所衍生的問題」，但是，在進入本題之前，我們先從廣袤的歷史背景談起。從文化史及思想史的立場來看，近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所經歷的是一個文化崩潰，也是文化重建的時代。在這個文化崩潰的時代裏，歷史學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；歷史學是一門關乎憂患的學問，歷史學家對興廢存亡的感受最為深刻，苦難的時代環境更能刺激史學的突破與發展。

1：2 就中國史學的立場言，這種文化崩潰與重建主要表現在：經學與史學的分道揚鑣，更切確地說，即是史學家「變遷意識」（或「時間意識」）的加深與史學之脫離經學而獨立。此外，歷史研究者對現代史學研究方法的接受，意味著文化格局的開展，更是時代重建的顯著表現。

2.近代中國史學的特質：

2：1 **傳統史學的特色**：傳統史家認為，歷史知識的究明是爲了達到道統教化之目的，因此在經學與史學密切結合的前提下，「價值判斷」與「事實判斷」往往合而爲一。

2:2 由於歷史敘述只是爲了論證普遍抽象的「理」或「道」，因而使變遷現象的研究成爲一種建構永恆道理的手段，造成中國史學傳統中的變遷意識不甚發達，歷史推演的概念較爲薄弱。

2:3 近代中國史學特質發展的先聲：

從孔子以降的大多數傳統中國史家，基本上皆認爲《六經》內的道理是超越時間與空間、放諸四海皆準的，例如董仲舒就說：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」，而王陽明在〈稽山書院尊經閣記〉裏也有類似思考：「經，常道也……無有乎弗具，無有乎弗同」。¹章學誠（1738-1801）「六經皆史」說的提出，²開啓「『道』在歷史中發展、在時間中進行」之新觀念，強調六經只是古史，其所承載之「道」，僅限於撰寫時代的消息，「事變之出於後者，六經不能言」；³「道」被《六經》寫進後仍然持續發展，後出之「道」，《六經》亦無法說明。這個思想促進了傳統歷史意識的強化。

中國史學之真正脫離經學而獨立，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看：⁴

¹ 王陽明：《王陽明全書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70年），「文錄」卷四，〈稽山書院尊經閣記〉，頁214。

² 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》（臺北：國史研究社，1972年），內篇一，〈易教上〉，頁1。

³ 同上書，內篇二，〈原道下〉，頁42。

⁴ 參考：李弘祺：《讀史的樂趣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公司，1991年），頁194-195。

(一) 從歷史哲學的立場言之：「六經皆史」說使中國史學跳脫經學的藩籬，歷史研究不再是用來見證真理的手段，而是一種找尋真理的方法。

(二) 從歷史範圍言之：章學誠云：「盈天地之間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學」，這種觀點使歷史研究的範圍擴大。例如五四時代北京大學國學門開始研究〈狸貓換太子〉之類的民間傳說，使民俗正式進入史學範圍，又如近代考古學與宋代以降發展的的金石學融為一體，進一步建立先秦史學的重要科目。

(三) 從輔助科學的應用上言之：社會科學的各學門如人類學、經濟學，乃至自然科學等都介入歷史研究，例如三十年代的《禹貢》、《食貨》等雜誌裏許多對社會史、經濟史的研究，即表現出史學對社會科學的有效運用。

(四) 從寫作的體裁上言之：史學研究由傳統的學案體裁如「六家」「二體」逐漸演變，過渡到雜記體（如顧炎武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、趙翼《廿二史札記》等），最後產生近代專業學術論文。

以上特色皆與近百年來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相應，其趨勢有二：

(一) 經典神聖性的動搖：《六經》的神聖性隨「六經皆史」說而逐步瓦解，成為眾多史料之一，史學因而

得以獨立發展。

(二) 歷史思考的新發展：史學家相信歷史的發展，可依人之理性加以解釋。例如顧頡剛所提出「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」的說法，顧頡剛《古史辯》第一冊自序中說：「我的唯一的宗旨，是要依據了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」。⁵理性化的態度完全表現在他們對傳統史料的批判上。

理性化的發展趨勢對中國現代史學造成莫大影響，促成民國以來二大潮流的發展：⁶

(一) 史料學派：以史料的搜集、整理、考訂與辨偽為中心工作（例如傅斯年說：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材料」）。對每一事實儘量作孤立的處置，因此主張「疏而不證」，不願意接觸如中國文化的形態及其發展歷程這樣的問題。在「史學即史料學」的理論支配下，若干史學研究論著「證」的範圍更退縮至材料的真偽上，淪落為與時代完全脫節、無生命的史學。

(二) 史觀學派：以系統的觀點通釋歷史全程為主要任務，例如北伐完成後，許多史家被「中國要往何處去」這個問題困擾而產生社會史論戰，並以郭沫若為

⁵ 顧頡剛：《古史辯（一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65、53。

⁶ 參考：余英時：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：反省與展望——「史學評論」代發刊辭〉，收入氏著：《史學與傳統》（臺北：時報出版公司，1982年），頁1-29。

代表，形成中國史學的正統唯物史觀。這一派史家認為史學之目的在為現實服務，或許更具體來說，是為他們從事的政治運動尋求歷史根據，自始便非從純學術的立場來研究歷史；由於史學與時代結合得過份緊密，表面在分析過去，實質上卻處處影射現在，史家以論代史，有時竟達到古今不分的地步，從而否定了歷史的客觀性。

無論史料學派或史觀學派，在某種程度上，各自擁抱西方史學的一部份，而與傳統史學之人文主義精神有其距離。中國史學必須回歸傳統的人文主義精神，才可能尋找到未來的出路。

3.近代歐美史學的專業化：

3：1 背景：十九世紀中期以後，西方社會進入一個平靜而安樂的時代，歐洲中產階級因而對自己的價值與未來滿懷信心。多數思想家與史家在回顧歷史時，認為人類依據某種規律而逐步演化：由簡單至複雜、從蒙昧至文明，其間有著直線發展的固定進程。他們認為歷史的真理是可被揭露的，一旦揭露後便不再改變，是故求取客觀的歷史研究成為當時史學的主流。⁷英、法、德等國的史學界都在十九世紀末年創辦史學專業學報。

⁷ 參考：王佳晴：《西方的歷史觀念—從古希臘到現代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公司，1998年），頁230-232。

3:2 德國史學：1985年，Heinrich von Sybel（1817-1895）創辦 *Historische Zeitschrift*，這份《歷史學報》的發刊辭期許自己成為「一份合乎科學的學報，首要任務即是表現真正的歷史研究方法……」。⁸十九世紀的德國，正處於一個「歷史主義」相當興盛的時代。所謂「歷史主義」，代表一種觀點：認為思考歷史現象必須將它放置於演化的脈絡下思考，並講求研究的方法，而非停留於形式主義的陳述。

3:3 法國史學：*Revue historique*，由 Monod（1844-1912）創辦於 1876 年，發刊辭宣稱自己是專業的科學歷史研究刊物。⁹

3:4 英國史學：*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*，是由 the Rev. Mandell Creighton（1845-1901）所創辦。《英國史學評論》發刊辭宣稱他們欲免除政治的以及宗教的干擾，並擴大歷史研究的範圍，強調歷史不應該自我設限在政治史的狹隘範圍內，必須研究人類過去的全史。¹⁰

從以上三家史學專業刊物發刊辭的內容，可看出十九世紀下半葉歐陸重要史學刊物的創辦，皆以科學史學為新的動

⁸ 參考：Fritz Stern, *The Varieties of History: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* (Garden City, NY.: Doubleday & Co., Inc., 1959), pp171-172。

⁹ Stern, *op.cit.*, pp. 172-173。

¹⁰ Stern, *op.cit.*, pp. 175-177。

力，可視為一種專業化的趨勢。

4. 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：

4：1 契機：近代中國史學專業化趨勢的契機，就是章學誠「六經皆史」說。

(1)「道」：從靜態到動態

章學誠說：¹¹

六經皆史也。古人不著書；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，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。

在傳統的理解中，「道」是永恆而靜止不變的，它超越於歷史事實之上，並統治著歷史事實。章學誠的「六經皆史」說劃時代地將六經從典律地位拉下，使其成為歷史研究的諸多資料之一，另方面又指出「道」是變動不居的，《六經》受制於撰寫的時代，因而無法言說全部的消息，三代以下之道必當於史中求取。

(2)「六經皆史」的涵義：

(一) 章學誠說「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，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，而不知六經皆器也」：¹²

《六經》撰寫的原初動機，只是為了記錄先王

¹¹ 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》，內篇一，〈易教上〉，頁 1。

¹² 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》，內篇二，〈原道中〉，頁 39。

政典的歷史過程，而非一開始就立意於載道。

(二) 六經皆史之「史」指涉的是三代以上的歷史，與「史料」的「史」有所差別。

4：2 變遷意識的深刻化：經過十八世紀章學誠「六經皆史」說的洗禮，中國近代史家之變遷意識較過去深刻許多，例如：

(1) 錢穆在《國史大綱》說：「變之所在，即歷史精神之所在」，¹³認為歷史會隨時代的遷移而持續地變動改寫。

(2) 顧頡剛提出古史的「層累造成說」：認為古史傳說固然大半出於自然的演變，卻也有相當的成分出於後人之有意偽造，歷史因而在不斷地增刪修改過程中逐漸成形。此種思考即建立在變遷意識的深刻化上，從中可看出這二大學派雖形同水火，然在表面的差異下，卻有實質的相同性。

5. 結論

5：1 近代史學研究的專業化表現在以下三方面：

(1) 就史學工作者而言：傳統治史者多為官員兼職的業餘史學家，近代則出現了以治史為主要任務的專業史學家。所謂專業，意指研究者在接受規格化的嚴格

¹³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（上）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96年），頁7-8。

訓練後，可經過一定的程序，彼此印證各自所建構的知識。1928年中研院史語所的成立，可說是史學專業化的一項標誌。

(2)就研究方法而言：發展出一套蒐集史料，論證史實及驗證論證的程序與方法。

(3)就讀者群而言：由一般大眾轉入為數甚少的專家。

5：2 專業化以後的問題：

(1)史學成為專家之學，成為少數人控制的語言遊戲，容易受到專家之意識型態的滲透。

(2)變遷意識深刻化所引起的「價值相對化」思考，使人們只有專業與否而無高低先後判準的觀念，學問因而由研究者的生命逸脫出去，以致可能造成「價值之虛無主義」的問題。

貳、閱讀作業：

- 1.余英時：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：反省與展望〉，《史學評論》，第一期（1978年），頁1-24。
- 2.傅斯年：〈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〉，《中央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一本，收入：杜維運、黃進興編，《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》（二），頁926-979。
- 3.Fritz Stern ed., *The Varieties of History* (Garden City, NY.: Doubleday&Co., Inc., 1959) Part I, Ch. 10, pp. 170~177。

- 4.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》，〈易教上〉，〈原道中〉，〈原道下〉。
- 5.胡適：〈國學季刊發刊宣言〉，收入：《胡適文存》（台北：遠東圖書公司，1961年）第二集，卷一。
- 6.顧頡剛：《當代中國史學》（香港：龍門書店，1964年）。
- 7.顧頡剛：《古史辨》，〈自序〉。
- 8.顧頡剛：《史林雜識》，〈小引〉。
- 9.顧頡剛：《秦漢的方志與儒生》，〈序〉。
- 10.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，〈引論〉。
- 11.錢穆：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，〈序〉。
- 12.何炳松：《通史新義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0年）〈自序〉。

參、參考讀物：

- 1.李弘祺：〈近代西洋史學之發展〉（上）（下），《思與言》，15卷4期及5期1977，11~1978，1月。
- 2.李弘祺：〈歷史主義的危機與超越〉，《史學評論》，第一期，1978年。
- 3.夏伯嘉：〈馬克布洛克與法國年鑑學派〉，《史學評論》，第一期，1978年。
- 4.汪榮祖：〈白德爾與當代法國史學〉，《食貨復刊》，6卷6期，1976年。
- 5.余英時：《論戴震與章學誠》，尤其是〈內篇〉第五章。

- 6.杜維運：〈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〉《台大歷史學報》，第三期（1976年）。
- 7.汪榮祖：〈梁啓超新史學試論〉。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第二期，（1971年）。
- 8.李弘祺：〈漫論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意義〉，《食貨復刊》，10卷9期，1980年12月。
- 9.唐代史研究會編：《中國歷史學界的新動向》（東京：刀水書房，1982）。
10. Anne F. Thurston and Jason H. Parker eds., *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* (New York :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, 1980).
11. 余英時：《史學與傳統》，（台北：時報出版公司，1982年）〈自序〉。

肆、思考問題：

1.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史學界在研究方法上有何重要發展？其問題何在？
2. 試就英國、法國、德國等三種《史學評論》發刊辭之內容互作比較討論之。
3. 「六經皆史」說法的提出在中國史學史上有何重要性？
4. 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所遭遇之基本問題何在？應如何解決？